

燕京学堂续谈——可化拙计为良策

前言：静园保住了，民主决策之光辉又一次照亮北大！然而，接下来的路还很长很长。从大局看，学堂之“选址”实属末节，其“办学方法”和“培养计划”才是问题的核心。若依现有计划任其发展，其危害远胜侵占静园，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静园之争已清楚地告诉我们，燕京学堂可以是掏空北大的拙计，但也可以是复兴中华的良策，全看咱北大人如何争取。回头看看，也许它最初选址静园未尝不是件好事；奄奄一息之北大精神如温水里的青蛙遭了电击，猛地跳了起来！我们定要它借势走出一条活路，而万万不是落回去待毙。

正文：

今先诊现有教育之病，论“中国学”应为何物，以示现有计划之拙劣。再开未来教育之方，述“燕京学堂”如何办学，以化拙计为良策。

一、诊断篇——中国学应为何物

校方既言中国学继承“五四精神”，并让胡适先生、蔡元培先生在宣传片中打头阵，我们不妨从两位老校长的背影望去，先谈中国学该研究什么问题，再谈中国学该培养什么人才。看看百年之后，中国学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还是将之丢弃。

1. 该研究什么问题

中国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高深学问。然则何为中国梦？胡适先生之《非留学篇》有言：“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吾国今日之急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矣。以是为吾民国之教育方针，不亦宜乎？”

痛哉！一百年了，“中国新文明”之梦想仍遥遥无期，且渐行渐远。追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我之精神”扔得干净，二曰“他之精神”学得粗浅。三曰“取长补短”毫无章法。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

何谓我之精神？我之精神即是以国学与中文为载体的传统思维模式与治学方法。当今我国中小学教育仍是当年苏联体系，私塾传统早已沦丧，对国学的教授只有少的可怜的几篇古文和诗词。而大学教育却于国学教育之补救方面毫无建树。在北大，政治、数学、军训，甚至英文都是全校必修，而大学语文却不是！？北大除了中文系毕业生，还有多少能诵四书五经，还有多少能把四大名著说给人听？别说是诵书说书，就算是照着念书，不少学生估计也会如清华某校长一般白字连篇。

无法让学生出色地掌握国学和中文，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悲哀。学生不读《老子》《易经》何以知中国哲学境界之高深？不读《大学》《中庸》，何以知中国治学之精神？不读《春秋》《史记》何以知中国历史之悠久，思辨之方法？不读《诗经》《楚辞》何以知中国文思之绚烂？不读《西游记》《水浒传》何以知中国想象之丰富，叙事之酣畅？不读《非留学篇》《傅雷家书》何以知中国师夷长技之楷模？言而总之，不学国学则不知传统中国之文明，便无法体会中西之不同，更谈不上“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由此可见，欲以中国学实现中国梦，其第一步莫过于重拾国学与中文教育，提高学生国学素养和中文水平。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校方冠以中国学“中国主体性为基础”与“高端学术”之华丽描述。

何谓他之精神？他之精神即是以西学与外文为载体的现代思维模式与治学方法。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教育开始了“一心向西”却渐行渐远的不归路。在北大，入学第一个考试即是英语分级，接下来还要有四级，六级，甚至托福，GRE，学生大量的牺牲课余时间用来背单词，做阅读。而如此卖命地学习英语，中国学生的英文水平却越来越差。悲哉！很多中国学生口语差，表达生硬且口音令人费解；听力差，很难适应印度和欧洲口音；文法差，阅读和书写文章事倍功半，不得不因此选择和读写较少打交道的理工科。怪哉，哪有越学越差的道理？有人说中国人英语是从来就很差，因为中英文差异太大。这是无稽之谈！当年庚款留学的人还在用文言文写作，岂不是和英文差异更大，为何当时的人英文学得那么好？曾几何时，有一位主修理工科的中国人做了“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他就是赵元任先生。听说他从长江顺流而下，每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方言和老乡交流。赵先生之牛固然有他的天才因素，但何以解释民国那一代学者普遍深厚的外文功底？唯一的解释——他们的中文比我辈好太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思想、情感和母语紧紧挂钩，甚至可以说被母语定义。母语都学不好，怎么可能学好外语？母语的言体系没有建立好，以何为参照系容纳外语？大学不重视培养学生母语，有何方法提高学生的外语？反之，若能掌握比现代英文体系复杂得多的古汉语体系，难道学英文不是易如反掌吗？若能兼容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语音，难道会被印度和欧洲英语的微小口音所难倒吗？

学外文之道理如此，学西学之道理何尝不如此。国学没搞好就贪心西学，犹如消化不良之人猛吃大鱼大肉，必是穿肠而过还不免满嘴臭气。反之，熟读战国历史，才能将国际关系学得更透彻；体验过农村生活，才能将民主诠释得更全面；精通唐诗宋词，才能将诗人肖邦演奏得更传神；懂得中医和占卜，才能洞穿“大数据”和“模式识别”与传统科学之本质不同。有个极端的例子，当年蔡元培先生，蔡老校长聘请梁漱溟先生来北大任教，只因为他的一篇《究元决疑论》，竟是以佛教思想解释量子力学！然也，学问到了深处，无须刻意“跨”学科，搞“交叉”，各科之理自然融汇为普世之道，“我”与“他”之精神边界亦随之消解，融会贯通。《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言而总之，丢弃我之精神，则他之精神必学得粗浅；领悟我之精神，才能如朱青生教授所倡导的那样，以“中国的眼光，现代的立场”，将他之精

神学得彻底，纳为己用。由此可见，欲以中国学实现中国梦，其第二步是在通达国学和中文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西学和外文。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校方中对中国学“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维度去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华丽描述。

何谓取长补短？取长补短即是以译书与立著为载体的文明输入与文明再造。外国的学问学不深刻大抵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读外文书但外文太差而读不懂，二是读中译本但翻译太差而无共鸣。故无非两种方案，一则下大力度学外语直接读懂，二则下大力度搞翻译输入文明。当下我国学术之羸弱已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牺牲中文搞全民外语是末路，因为中文还没学好外文不可能学好，外文学不好则西学不可能学深，事倍功半地向西学习必然荒废国学和中文而形成恶性循环。反之，学好国学求高明翻译是正途，可以说是一人辛苦，全民受益，节约全民学习成本，使国内学术持续发展。

翻译有信、达、雅三层境界。“信”尚多在语言层面，而“达”和“雅”已深入精神层面。当一本书被精准地翻译为中文，其实书中的他之精神即被转化为我之精神，其蕴含之道理不但不会打折扣，反而会增添新的意义。这里仅举最通俗之例：类似之物可照搬，如叫 tomato 番茄，国人立即知晓大致何物；相似之理可借鉴，如叫 office hour 答疑时间，国人立即知晓其目的，原文无此意；新事物可造词，如叫 cellphone 手机，国人立即知晓用法，原文亦无此意；最后，确实需要音译的才音译，如“阿弥陀佛”。而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别说是翻译学术著作，就算是翻译宗教典籍都不在话下。从鸠摩罗什尊者开始对佛经的成功诠释就是最好的例证。言而总之，我们应该从翻译经典之正途开始输入文明，不然他之精神就是他人的，和大多数国人永无关系。以此为基础，国人可省下学习外文的时间，事半功倍地用中文著书科研，创造新文明。久而久之，学术扎根，自内而外蓬勃发展，才能摆脱对西学的依赖，则离汉唐之盛不远也。此绝非痴人说梦，我们的近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已经阶段性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日本虽文字包容性不如中文，却极其重视翻译和用日文科研，当今日本之学术已自成体系，其机器人领域更是世界一流，他国争相来求。由此可见，欲以中国学实现中国梦，其第三步是在通达我之精神和他之精神的基础上，用精准的中文翻译经典，加强以中文为载体的学术科研。

综上所述，“我之精神”是国人立足世界的核心竞争力。当今我国学术萎靡的病根，在于教育对国学和中文的忽视！故而，无论是发扬五四精神，还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学该研究三大问题，一曰重拾国学与中文教育，二曰重新审视西学和外文，三曰翻译经典并倡导中文学术科研。此亦拯救中国高等教育最切实之方法。至于校方所言“跨学科”则毫无必要；而至于“接轨国际”，像辜鸿铭先生那样用精湛的外文表达《中国人的精神》，那是在贯通中西之后才谈得上的问题。当下的北大没有这个闲暇，更缺少这个实力。

2. 该培养什么人才

立意既定，则不难看出：中国学应致力于培养学贯中西，能为中国创造新文明的学术精英，而绝不是前途无忧，有张北大文凭就好的官僚子弟。当大

学培养之人才不是学者而是官僚，北大将退回到蔡元培先生掌校之前的黑暗。换言之，北大精神亡矣！顾颉刚先生（胡适先生之弟子）在他的《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中回忆道：

“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痛哉！往事不堪回首，岂容重蹈覆辙？黑暗年代之罪魁祸首，在于行政对学术的侵蚀。而今天，北大之处境何其相似！遍观其貌，表现有三，一曰领导之政务禁锢自由，二曰教师之考评流于指标，三曰学生之课业舍本逐末。三者亦环环相扣，互为因果。

何谓领导？掌校北大者，不苛求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之大贤，但须为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之师表；思想上统领全局，行政上服务师生，以北大学术科研之建设为第一要务。若仅为一科之专家或纯粹政府官僚，则无能力兼容并包百家争鸣之学术思想，更有甚者心思全然不在学术。人文关怀不足而居其位统领全局，则不得不以行政权利束缚师生自由以掌控局面；真知灼见不足而谋其政建设学术，则不得不以“核心期刊”，“各级奖项”，甚至“建楼扩地”等种种指标体现其“政绩”。最终导致其政务空有学术之名，而无学术之实，坏风气自上而下蔓延到老师。

何谓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且不想当教授的教师不是好教师。既然学校以指标审评教师，教师则不得不以达标来回馈学校——终日在文章数量、奖项级别和经费多寡之间疲于应付，更有甚者致力于关系门路之捷径。久而久之，疏于学问和教学质量，风气日下且继续向学生蔓延。

何谓学生？学生是学习如何生活、如何生存之人。大学新生多是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年，如一块块美玉等待着大学生活的雕琢。每一个北大人都会不会忘记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候的那份赤子之心和鸿鹄之志，那份对北大生活和大师风采的向往。只可惜，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试问教师们忙着落实指标，能剩下多少精力教授课程，指导社团？天之骄子“热脸碰冷屁股”，在被行政侵蚀的学术环境中自生自灭。课堂中寻不见大师生活之道，则不得不退而求工匠生存之计。君不见，选课但求容易，排队争修经双，大四一纸文凭，毕业如梦初醒，感壮志之不复，叹前路之茫茫。对学术科研痴心不改的残余部队，大多也早已从老师的两难处境中看见国内学术道路之狭窄，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以数倍于常人之艰辛继续追

求微茫之理想。痛哉！如此大学生活不知道消磨了多少学术的激情，扼杀了多少大师的苗子。更可悲的是，今日的学生就是十年、二十年后的教师、领导。今日无法让学生青出于蓝，未来则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久而久之，一代不如一代，陷入恶性循环。

学术环境如此恶劣，北大精神何以多年屹立不倒？黑暗中的微芒火种——新生！新学生者，北大新生命也。北大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新生。从高考全能，到竞赛专家，从运动健将，到艺术特长，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一囊德、智、体、美领域之少年英才。他们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前仆后继，总有一些孩子和他们憧憬中的北大在一起，保全了北大精神微而不灭，弱而不亡。言而总之，新生是北大的王牌，更是北大的底牌。今日，中国学坐阵北大学术之要地，若换以官僚子弟为培养对象，无异于丢弃救命稻草。以当下之风气，其后果恐更甚于百年之前。因为“结十兄弟”比不上领导教授的鞍前马后，“八大胡同”更比不上女大学生的左拥右簇。此乃置北大精神于前有侵蚀，后无补给，腹背受敌之绝境！温水里的青蛙被盖了盖儿，岂有不速亡之理？反之，若召集全国之优秀毕业生为先锋，引领全北大恶补丢失已久的国学与中文，则可从源头开始强化学术能力，净化学术环境，让一批批学术精英还北大精神以良性循环。五年，复苏国学与中文教育可待矣；十年，新生一代大师之苗可待矣；二十年，繁荣中国之学术可待矣；五十年，创造中国之新文明可待矣！

综上所述，大学之治，短期靠行政，长期靠教育。北大精神萎靡的病根在于行政禁锢学术自由，而呵护新生火种远离庸政侵蚀，则是振兴北大精神的正途。北大无法奢求政府再恩赐一位大贤校长，却可以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学术领袖。故如前言，北大应培养之人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不是前途无忧的官僚。这也是同时实现校方“高端学术”和“未来领袖”美好愿望的唯一途径。

诊断篇总结：北大精神诚如温水中之青蛙，纵有百年气力而日渐萎靡，奄奄一息。国学与中文之浅陋好似高温，扼杀其活力；行政对学术之侵蚀好似容器，束缚其自由；唯有一批批的新生好似新鲜空气，保全其性命。今日之中国学粉墨登场，若以外国官僚为培养目标，倾全北大之力用英文讲“半吊子”国学，则对我国学生之国学功底毫无改善，而对外国政客之中国学问有所增益。他人虽浅尝辄止但足以傲视国人之毫无所学，失去核心竞争力的我国学术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此则他人知己知彼，而国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细思恐极，吾不寒而栗！

二. 药方篇——燕京学堂如何办学

病情既知，今对症敬拟五味药，分别为“配置国学课程”，“甄选学术人才”，“加强社团实践”，“教师选贤任能”，和“善用纽带关系”。下逐一述之。然须知药方为一时之策，非不变之计，故得诊断者可自开良药，得药方而弃诊断者非长久之道。

1. 配置国学课程

“学者则难者亦易，不学则易者亦难。”课程乃教育之载体，无精良国学之课程则重拾国学教育必沦为空谈。燕京学堂应借鉴北大现有之文科建设，为全北大设计一套课程。以高考优秀水准为基础，以三至四年内达到秀才水准为第一期目标。这是一项艰难的教学任务，需要整个北大文科教师团队的智慧，然北大不为风气之先谁为之？余仅提醒注意以下几方面。

- a. 课业分量：中国学硕士之课业密度应与本科生相仿，每学期至少 25 学分国学课程，所有课程须向全校学生开放。**精选 15 学分国学课程为全校理科必修，20 学分为全校文科必修。**（理由）将国学设为全校必修是挽救教育之根本，不用此策则其余手段无处着力。北大数学必修 8 到 16 学分文理不等，政治 12 学分，连英语都有 8 学分。国学价值更胜前者，故学分更多。
- b. 教学宗旨：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国学之内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借内容启发丢失已久的传统治学方法和思维模式。
- c. 教授内容：要发展地看国学。除了传统国学，要注重四大名著等经典白话著作和民国大家之思想著作。（理由）好的古文和白话文都要学，古文底蕴足，白话应用广。民国大家往往学贯中西，其思想对我辈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也是对北大自身历史的学习。
- d. 教授方法：务必从原典出发，七分靠理解，三分靠背诵。（理由）我辈无私塾基础，人大了记忆力下降，但理解力上升，故应以理解为主，背诵为辅，不可照搬私塾教育童生之法。但适当地背诵是必须的，有时候不吃“背诵全文”的苦则不能理解国学的精髓。如《大学》《中庸》篇幅者，以北大学生的智商花些力气还是可以背下来的。
- e. 教学语言：语言乃思想之载体，原典是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教。故如讲《中国人的精神》《京华烟云》等著作要用英文。
- f. 教授顺序：要注意国学内容上的紧密联系与传承关系。切勿求快速进，囫圇吞枣。（理由）私塾以背为主，故可不太在意内在逻辑。今日学生以理解为主，若跳着讲容易一头雾水。再者北大很多系有“以人为本”的陋习，开课不凭学科本身而看老师能讲什么，国学之课程设置万不可如此。
- g. 编纂讲义：尽量公开讲义和网络课程，以便其他高校和中小学一起进步。

2. 甄选学术人才

- a. 招生：特殊时期，提议采用一部分靠申请，一部分靠邀请的招生方式。除正常申请程序外，邀请全球学术精英（可参考 US news 专业排名 top5 的博士们。从刚刚收到博士录取的人，到已经博士毕业的人全算在内）利用休年档期（gap year）来北大参加一年的国学集训。（理由）已然是学术精英的人，对西学和外文必然已有一定造诣，若加强国学学习，则可立即“重新审视他之精神”。再者，他们学不学国学将来都是学界的栋梁，既如此，不如让栋梁更优质些。休年档期往往用来游历世界，结婚生子，回炉读硕士没有功利价值。若真的肯来，一定是真心想学，何乐而不为？
- b. 录取：分两道关卡，审评和考试。
第一关：审评申请和发出邀请都要由学术委员会制定具体标准。符合标准即有参加入学考试资格。
第二关：通过入学的国学与中文水平考试。试题和录取线亦要由学术委员会制定，建议至少有高中毕业之优秀水平，能读写简单古文，可识繁用简。
- c. 年限：三年。三分之二时间上课，三分之一时间实践。邀请制学员可申请加大上课密度免去实践，以把年限压缩到两年，优秀者可申请远程完成第二年学业。
- d. 待遇：高额奖学金和优待宿舍不可兼得。建议奖学金减半，改住普通宿舍。（理由）校方所定每月 2000 美金完全可以天天住宾馆，何必还分勺园呢？学术领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故应该和北大文科研究生住宿同等待遇。吃住在学校，每月 1000 美金已经十分殷实，学生不是老爷，来学习不是来购物。若拖家带口来学习可考虑增加奖学金贴补家用，具体数目依具体情况由学术委员会决定。
- e. 毕业：除完成课业外，每人需翻译一本外文经典专业书籍，或其主要章节。学生的学科背景是什么就鼓励翻译什么，中文系出身则鼓励翻译文学作品。理由在“诊断篇”已详述。

3. 教师选贤任能

- a. 内用：燕京学堂应以北大中文，历史，哲学三系之中坚力量，组成学术委员会，统领中国学学科建设，带领全校重拾国学与中文教育。北大虽然大师数量不如从前，但只要通力合作，三个优秀教授顶一个学术领袖。若可继承梅贻琦先生“教授治校”之法，北大必能走出困境。
- b. 外聘：对于相对薄弱的方面当然要聘请一流的专家前来讲学。例如讲胡适则可邀请李敖先生。

4. 加强社团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校方欲在燕京学堂教学中加入实践成分，这是明智的决策。实践并非要找大块时间到校外进行，而是最好结合在校园生活里。北大的社团被称为第二课堂，是参加实践的最好选择！但是，北大虽号称百团大战，其实优质社团，尤其是和国学相关的并不多见。今拟二法：

- a. 聘请老师：为北大社团，尤其是国学相关社团（如国学社，中乐学社，越剧学社，书法协会，话剧协会等等）聘请指导老师。（理由）社团是师生建立师承关系的有效途径，可弥补书本教授的不足。没有指导老师社团很容易变成学生随便玩玩的地方。五四时期多是教授们牵头搞社团，今要继承传统。
- b. 增拨经费：为社团提供活动经费，建立活动经费审批报销程序。（理由）北大社团是非营利性的，穷学生没有经费靠什么办活动？现在有规模的社团大都是拉商业赞助，耗时耗力，且有损于学生社团活动的纯粹性。

5. 善用纽带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燕京学堂要带领整个北大拯救教育，而不是自己独活。今利用燕京学堂的学科战略要地和庞大的资金优势，拟五法：

- a. 帮助各系译书：系统组织中国学学员翻译经典书目（参见条目 2e），结合各系教师的力量为各系输入精良的中译本教材和参考书目。（理由）很多系的教材没有精良的中译本，导致学习时硬着头皮看外文书，期末狂扫中文版本应付考试，何苦如此。译书之重要无需赘述，然当从中国学学员做起。
- b. 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尤其是文科教师，具体额度由学术委员会拟定。（理由）吃不饱肚子没有人会用心教课，且文科教师待遇的确太低。校方近来通过裁剪行政人员的数量和工资的方法调节教学和行政的比重，心愿是好的但此为下策；上策是提高教学人员的待遇。
- c. 促进社团发展：参见条目 4。
- d. 拉动全国教育：首先，尽量公开课程资料（参见条目 1f）。然后，设立“国学特长生”以鼓励中小学国学教育。具体考评标准由学术委员制定
- e. 办中文刊物：提议恢复《新青年》之刊物传统，纸板刊物和多媒体并重。刊登国外新思想的优秀译文和国人的新思想。（理由）重拾国学教育一旦正式起步，中西思想才真正地碰撞起来，新思想必如五四时期一样不断涌现。刊物是新思想的集散地，当今时代不但有纸板刊物，还可有影音刊物，提高思想交流效率

药方篇总结：北大应是民族的脊梁，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在暗流中砥砺坚守；拯救北大即是拯救中华。中华自强则他国竞相来朝，届时天恩浩荡，赐他国留学生以国学精华则可图世界和谐。故本文追本溯源，固本自强之法为上策。而今校方欲以仅存国学之余温敬献他人，则无异于烹独子以献虎狼邀宠，得一时和气而后患无穷，实为拙劣不堪之下下之策！

2014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 夏光宇写于美国宾州

注：文中所有“校方所言”均参见7月25日校方主页公告《关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建设进展情况的说明》，7月11日刘伟副校长专访记录《用“中国学”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6月17日光明日报之《我们为何要打造“中国学”学科》，燕京学堂英文网页 <http://yenchingacademy.org/>，以及静园小组整理的《“燕京学堂争议”资料汇总》。